

序章 压抑负罪意识的文化

亢进与冲动的时代

人们在小小的群体里生活，在与大自然共生共栖的日子里，气氛是平和的。倘若患病或者失去亲人，人们会很自然地陷入悲哀。与亲人在温暖的火炉前共度时光，心情则自然而然地轻松愉快。尽管不时发生的事情会使我们产生一时的悲伤与欢乐，但平日的气氛仍如宽阔的大河一样静静地流淌。

然而，一旦国家开始从根本上左右人们的生活，社会气氛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被时代的气氛所动摇，失去了生命所具有的平和感。

我强烈地意识到时代的气氛是进入 80 年代之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物质上变得富裕，日本社会从战败与复兴的紧张中走出来，开始了对过去的全面肯定。1985 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我从地铁口一上来，就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手持太阳旗和灯笼的人的波涛中。旗帜、灯笼淹没了灯火下的银座大道，成千上万的人汇成的人流从京桥涌向日本桥。这是“昭和六十年”的大游行。从全国各地聚拢而来的老年人——也混有青年人和中年

人——的游行队伍浪潮般汹涌起伏，人们吵嚷着“尽管有过战争，有过战后的混乱和贫困，总的来说昭和年间还是盛世！”我被这人流裹挟着向前走去。

那个夜晚的事我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因为搞不清自己被抛入了哪个时代。似乎返回了小时候观看国民体育大会或是植树节游行时的自己，又好像是在昏暗的电影院里，耳边响着播音员煞有介事的声音，看着战前的新闻片。无论是太阳旗的红色，还是灯笼的光亮，都像毫无生气的鬼火一样在我的脑际晃动。

就这样，眼前的景象似乎在距我很遥远的地方，可又让我鲜明地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氛。

时代的气氛中漂着浅薄的“幸福”色彩。说得准确些，是一种“欣快症”，即内容贫乏、空虚的“轻松愉快”，是无视现实，预先就认为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的精神状态，其背后是自主性的衰减和冲动性的亢进。

人们不安地忙碌着，陶醉于泡沫经济。对于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从来不去验证，一味地对着虚幻的幸福微笑。政治的空洞化、陷入困境的金融、官僚机构的臃肿、参与亚洲各国的垄断开发、无目的的信息化、孩子们的闭塞感……对各个问题都只做出冲动的反应，即使有时会皱起眉头，痉挛般地流出眼泪，也没有深深的悲伤。

不断地可以看到地道的欣快症的书，鼓吹什么“只要积极地向前看，就会分泌出脑内啡，一切都会变得可能”。难道日本的近现代走的就是一条吗啡中毒之路？

在当今的“欣快时代”之前，曾是“焦躁时代”：急于实现近代化，谋求富国强兵，力求最大限度地运用攻击性。这样的社

会基本上是压抑的。人们的情绪容易变得异常，崇尚权威，谋求攻击的对象，寻求刺激。按照地位、职务、身份、性别等，兼有优越感和自卑感，随时想着对谁要卑谦恭顺，对谁要威迫压抑，对谁要宽容。这种优越感与自卑感，盛气凌人与卑躬屈膝的混合，从家庭、友人、近邻的关系开始，直至与亚洲人民的关系。不能和他人持平等关系的人，把不间断的精神紧张误解为美德。人们异乎寻常地在焦躁情绪驱使下行动，正是战前日本社会的主流气氛。

从焦躁时代到欣快时代，为什么时代的气氛发生了转变？日本社会只能选择这种转变吗？

为什么人们感情呆板、单调到了如此程度，以致使愉快变成了一种强加的东西？情有喜怒哀乐，并不是喜欢其中的哪一种就可以拿出来任意扩大的。只有能够充分感受到悲伤的人，才能够充分感受到欢喜。在快乐的感情涌现出来之前就先做出笑的态度，这种人的感情是不可能丰富的。

没有感受到的悲哀

70年代中期，我曾读过亚历山大·米切利希与其妻子玛加丽特（西德的精神分析学者）合著的《丧失的悲哀》（林峻一郎、马场谦一译，河出书房新社出版。原著1967年出版）。在这本副题为“集团行动的基础”的书中，他们质问道：“意识到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就杀死600万人、已看不到任何支撑的德国社会最后还要做些什么呢？要进一步否认其动机？似乎如果不这样，就只有走上忧郁症一条路了。”他们指出，实际上并没有患

忧郁症的德国“政治上、社会上的一无所获是从否认过去中产生的。对于必须承担的罪责——无论是行动的罪，还是忍耐的罪——所进行的共同防卫，在社会品格中并非不留下痕迹。”尽管如此，“今天我们在与走上国家社会主义完全相同的根本立场上操作着我们联邦共和国的经济。”

这就是说，没有充分地感到悲哀的德国抹杀了过去，向着经济复兴突飞猛进。那么究竟对于什么没有感到悲哀呢？是纳粹主义理想的丧失，还是600万犹太人的死？米切利希的分析在这里是暧昧的。

我读《丧失的悲哀》时，只是对“否认过去会在社会品格上留下痕迹”这一理所当然的主张予以赞同。

那之后过了10年，随着时代的气氛越发向着欣快症、浅薄化发展，我再次开始思考我们究竟对于什么没有感受到悲哀。

我出生于太平洋战争的末期，在战后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逐渐用现实主义的口号排除战后理念的时代里告别了青年期，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成为精神科医生、知识分子。对时代一直采取批判态度的我现在已人到中年，常常感到自己感情的贫乏。为什么不能有更丰富的想像力，不能把感情移向他人？为什么总是重视发生的事情和知识，而不是更加关心其中的感情或是动机？尽管知道人生的充实不在于知识和意志，而在于感情的流淌，但是为什么与获知某一成就、结果相比，认为去感受感情——无论是他人的感情，还是自己的感情——是第二位的？

这是个人的问题，也是集团的问题。因为包围着我们的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指引着我们如何去处事，如何去感觉。在这个国家

里，许多中老年人感情僵硬，缺乏同他人坦诚交流的能力。大企业的管理层、官僚、学者、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所谓的优秀分子们绝非是感情丰富的人，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他人感情的感受能力、想像力过于贫乏。另外还有同样一心一意适应这个社会的普通老百姓。作为他们孩子的青年一代更是感情淡薄，把人和人的交流仅仅作为信息的交换，充其量是作为身体的接触来考虑。

我们不想知道事实，甚至在知道之前就强辩“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不是侵略战争，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争”、“不能承认自虐史观”等等。通过否认过去，我们失掉了什么？否认亲身经历的事情，形成变态心理，被压抑的心灵伤痕带来感情的僵直和病态的冲动。我们真的生活在与那场侵略战争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吗？通过否认过去，我们嫁接了什么？

战争的确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而且这期间也发生过争取废除核武器的和平运动，但对个人不予以尊重，一味地适应集团的需要，怀着激烈的竞争心理，只看到人与人之间上下关系的文化，还是同过去一样。崇尚学历、名牌学校，注重所属组织的优劣，执著地追求在公司中的地位，使怀疑这种价值观的人产生不安的压力。此外，学校、工作场所的以强凌弱，使私生活贫乏的公司主义，加班及应酬等剥蚀着人的个性，驱使人们追逐业绩和晋升。这样的文化没有发生变化。

这同日军的内务班欺压新兵，通过刺杀中国人把人培养成战争之鬼，鼓动在军队中出人头地，对被压抑者的痛苦毫无感觉的侵略战争时期（从1931年满洲事变到战争结束的15年期间）日本人的精神相比，能够说二者有多大区别吗？让人们从小就去竞争，在羡慕和屈辱之间提高人的攻击性，进而组织起来的机制不

是相同的吗？

1945年8月15日的战败，使活下来的日本人失去了“八紘一宇”、“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狂妄理想，（1931年松冈洋右议员在众议院发言中提出的）所谓“满蒙生命线”的正当化也成为泡影。经历了战败的冲击、感情的麻痹及其后的混乱之后，日本人的反应可以说有两种类型。

一种反应是“无罚化”。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全都无须惩罚，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抓住这一点高唱和平。这种反应以和平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和平运动也有两个分支，一是从“一般性无罚化”的心理出发，主张绝对和平的团体，还有就是在对自己实行无罚化的基础上，主张应分为反战势力（社会主义圈）和好战势力（美国）来思考的意识形态上的无罚化团体。无论是哪一方，在不想正视自己做过什么，失去了什么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

另一种反应是由崇尚精神转而崇尚物质，用唯物的价值观掩盖战争的心理创伤，认为是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于是要通过经济复兴、重建工业、赶超美国经济而重新站立起来。这其中隐藏着不承认自己的精神颓废、不承认在中国文明前败北的固执，还隐藏着战争中极端精神主义的反作用而导致的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不是合理的、协调的经济主义，而是极端精神主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经济至上主义。这不过是把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移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物质的富裕就是一切。

这种经济至上的心态，在朝鲜战场特需（急速发展军工、后勤支援等，以满足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特别需求——译注）、经

济高速发展、以土木建筑业为轴心的地方补助金经济、东京集中（指东京强化其在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中枢机能——译注）、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被不断强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的主流。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挽回战败的精神，造就了否认心灵创伤的今日的日本文化。

那么日本人没有良心吗？全然没有负罪感吗？即使存在担心被周围知晓的耻辱意识，也都无论他人如何痛苦，全然不存在使自己感到痛苦的负罪感吗？

不，我不愿意这样想。

8年前我在近江的农村见到一位心地美好的老人，叫川崎太二郎。他同老妻一起生活，他们的食物几乎都是自己生产的。“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说这话时已经79岁的老人，在鸡舍内记着“米糠10公斤、鱼粉2.5公斤，牡蛎壳10公斤”等字样的褪了色的黑板上，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小小的鸡冠花哟，
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
那采野菜的孩子。
问声你在做什么？
柔美地微笑着，
抬头向我张望，
开口说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
是什么？

回答一句，
“女”。
孩子若还在世上，
已50岁？
怀抱着孙儿，
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
红色的山茶花哟，
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
美丽衣服的孩子。

黑板下面的阁板上插着一枝山茶花。这首诗或许是一直藏在老人心灵深处的一个战争加害者的负罪意识的表露。问及过去，他告诉我1931年到1934年曾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从1940年到1945年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终战。

虽然不能说是多数，但确实有一些日本人带着他们各自的负罪意识生活着，只是他们的想法既没能深化，也没能进行充分的分析，就这样过了半个世纪。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基本上是基于被害者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的新闻出版工作，说的都是战争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到头来还是无罚化。

尽管如此，仍然有人向人们讲述南京的屠杀，告诉人们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及南方发生的屠杀，告白自己作为宪兵、特务犯下的罪行，或是记述在败逃过程中将家人、同胞弃置不顾的罪责，但他们的声音战后一直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当年被动员上战场的学生兵中有一些幸存者，在这些人中还

存在着另一种负罪感，即真正优秀的人、好人没能生还，自己却活了下来（叫做“幸存者症候群”）。对此也没有人逐一地倾听、分析。

不知不觉地，我想去进行考察：不正视侵略战争，不去验证反复发生了怎样的战争犯罪，而是要去否认和忘却，这使我们的文化贫乏到了何种程度？我还想通过在认识罪中走过战后之路的少数人的精神世界，映照出多数人的形象。

自己的精神世界

为了寻求那宝贵的负罪意识，我像沙中淘金一样开始了走访调查。

这时我读了丹·巴尔恩所著的《沉默的遗产》（姬冈とし子译，时事通信社1993年出版）。巴尔恩曾随父亲由德国的海德堡逃亡到以色列，现在是心理学者。他在欧亚大陆另一侧的德国同纳粹犯罪者的子女们会面交谈，调查战争结束40年后，纳粹的孩子们如何看待父辈的犯罪。

80年代的西德将纳粹的犯罪告诉孩子们，表明只有反省过去才能构筑现在。由于对孕育了第三帝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欧洲各国容许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东西德的急剧统一。如果没有80年代的积极教育，欧洲对于德国的统一可能会感到更大的不安。

但西德到70年代中期为止，并没能进行充分的有关纳粹的教育。几乎所有的学校对学生父母那一代人的过去都讳莫如深，只是起了加强沉默的作用，历史停止在俾斯麦时代。

对于这位为寻找“沉默的遗产”而访问德国的心理学者，许多父亲曾是党卫队员的中年男女拒绝同他会面交谈，只有少数人忐忑不安地说出自己的身份，开始第一次讲述自己的精神史。他们的父亲在中央政府、死亡集中营和强制收容所、特殊作战部队、计划安乐死、盖世太保、输送系统等各种部门参与了大规模屠杀。这少数人中包括可以推测为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的侄子、纳粹党总部主任鲍曼的儿子，以及陆军元帅戈林的女儿等。

他的父亲是灭绝计划的实行者，同时也是热爱家庭和音乐的父亲。他真的了解自己的父亲吗？在战败时，在自杀之前，领着自己哼着歌散步的慈祥的父亲。自己的血液里也许残留着残酷的基因？他一直隐忍着这种不安而生活着。

有一位曾在奥斯威辛参与过死亡分选的医师的儿子，他拒绝了他的家族本应进入的知识阶层，当了厨师。他说：“战后的学校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这是很糟糕的。‘希特勒’这个单词曾经不存在。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自己去收集这方面的情况。这使得对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事，有的人相信，而其他的人不相信。”他们一点点地讲述着从人们都保持沉默的时代中生活过来的战后世代的心理纠葛。

著者终于从一位原为纳粹青年团员的男子那里听说，他的父亲是党卫队员，想要救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却做不到，因而精神错乱，在痛苦中不断地说着“基督也是犹太人，要尊重犹太人”。这使著者感到松了一口气。随着多次的德国之行，巴尔恩开始和父辈曾为纳粹的孩子们一起，去寻找纳粹后代的人类希望。该书的最后一章写道：在一次讨论著者所进行的研究的会议上，曾躊躇是否与会的纳粹的孩子们——已经过了50岁的人们——为了交

流个人成长的体会，开始创办自助团体。其后，巴尔恩把他们请到以色列，同在死亡集中营中被杀害的犹太人的后代共同度过了4天。

巴尔恩的研究告诉我们，虽然战争结束已经半个世纪，研究经历过战争时代的人们的人文科学仍然是可能的。遗憾的是，在亚洲生活的我们，一直没有条件作为加害者的孩子与被害者及其后代相互深入理解。但通过挖掘参与了战争的日本人的负罪意识，并进行细致的分析，我们仍可以把20世纪的意义告诉亚洲的人们。只有这种残存的负罪意识，才是我们的宝贵文化。通过揭示压抑负罪意识的日本文化现实，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

第一章 淹没于集团中

我把“战争和医师”作为第一章的课题，并从访问 80 岁的汤浅谦医师开始。

战后，大学的医学系同战前一样，牢固地维持着医局讲座制、强烈的业绩主义和极端的等级制，并控制着都市医院。医师会麾下的医师们依靠健康保险制度，把医疗和赚钱作为头等大事。这样的医学和医疗体系建立了庞大的医院，成功地操纵着电子器械，但却不能贴近病人沮丧的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日本的战后医学同战时直接相连，对过去没有进行丝毫反省。例如在中国展开细菌战，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陆军防疫给水部（即七三一部队）有关人员，战后却成了医学系的教授（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等）、公立医院的院长，或是在行政卫生部门供职，建立了像“绿十字”那样的血液制药会社。不尊重个人的传统，仍然被发生了艾滋丑闻的“绿十字”的企业文化，被厚生省和医疗工作者相互勾结而承续着。

并非仅仅细菌部队发生了医学犯罪。在战时的中国大陆，许多日军军医都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做卫生兵的手术实习材料。战争末期九州大学医学系用美国俘虏做活体解剖的事已广为人

知，这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多数军医对于他们作为手术演习或是教育而参与过的“工作”保持沉默，但汤浅医师却在不断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汤浅谦生于1916年（大正五年）10月，是一位开业医生的儿子，在东京京桥的越前堀长大。父亲是苦学成为医师的，以不分昼夜地为患者服务为乐。他是9个孩子中的老三，上面有姐姐和哥哥。小学一年级的時候，关东大地震使他的家被烧毁，给他留下了死亡的记忆。父亲的医院有一段时间设在临时木板房里，那时他和祖母疏散到千叶县住了两年半。在那里，东京来的孩子受到欺侮，当地的孩子们不和他玩，这同后来战争中被疏散儿童的遭遇相同。

返回东京上小学后，汤浅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位来自冲绳、分外努力的教师。这位曾经被歧视，经过刻苦学习成为教师的先生，大肆宣扬“日本人是优秀的民族，要征服支那，成为东亚的盟主”。汤浅清楚地记得这些话。

1929年汤浅进入东京市立一中（现为九段高校）。学校的旁边是靖国神社，上学下学经过时都得行礼。前一年（1928年）发生了“三一五”事件（对日本共产党人的大逮捕），在“治安维持法”下，社会大幅度地向军国主义倾斜。1931年爆发了上海事变，还有“五一五”事件。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他接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相信《肉弹三勇士》（上海事变时编造出来的故事），陶醉于《马贼的歌》中的歌词：“我要去那里，你也去吧，在狭小的日本已经住腻了”，深信“中国佬是劣等民族，只配卖拉面”。

1934年，成绩优秀的汤浅考上了东京慈惠医院医学专门学

预科。他回忆说，当时单纯地认为“认真学习，成为医生的话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对于自己生活着的时代、国家，一点也没有去思考”（《抹杀不了的记忆》，吉开那津子记录，日中出版社出版）。朋友中有个叫林俊一的人（现在在王子生协医院），因参加反战活动被捕，从第一高等学校退学后进入医大，他曾说过“战争结束后就没有地主了”这样的话。大家只是说“或许吧”，不过听听而已。

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件，冬天日军攻入南京。当然，汤浅对大屠杀全然不知，也并不关心。

1941年医大毕业后他成为驹込病院的内科大夫，在传染病房工作。这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去了战地，传染病的知识会有用的。当年10月志愿做短期现役军医，进入旭川的步兵第二十八联队。6月征兵检查时被建议做军医。

经过两个月的一般军训，他和同期的23人一起成为中尉军医。人们认为从皇族到士族是上等人，尽管汤浅觉得并非如此，医师入伍成为医官是理所当然的，但还是存在着取得了成功和被带到战场将临近死亡的复杂想法。汤浅是个接受现实并认真投入的人，不存在逃避现实或是陷入理念的倾向。他所受的是仅仅重视记忆和经验的医学教育，全然没有批判精神。

进入军队那年的12月8日，日军攻击珍珠港，开始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末他到中国山西太原附近的潞安陆军医院赴任。途中看到街上的苦力，他只是想“中国人也出人意料的勤劳呀”，并无同情之感。看到和作为军官的自己同坐头等车厢的中国人，觉得“岂有此理，中国人也……”，但并没有在言行上表露出来。

太原是提倡西贡罗主义、在地方军阀中惟一能够长命的阎

锡山的居城。1937年10月太原陷落。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和日军几乎没有交战，日军与从西面来的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苦战。

潞安陆军医院有1名中佐院长和8名军医。汤浅军医在这里的传染病房和病理检查室工作。传染病房里收住着排菌期的结核病患者和伤寒、副伤寒、赤痢、斑疹伤寒、回归热患者30来人。

上任40余日后的3月中旬，在军官食堂吃完午饭后，西村庆次中佐（医院院长，冈山医专出身，外科医生）让干杂活的人退下，通知说：“下午1点开始手术演习，全体人员到解剖室集合。”

汤浅想：“果然来了。”这是因为在慈惠医大做学生时就听说过军医做活体解剖。那时虽然觉得可怕，却也想试一下。

然而事到临头，抵触感却很强。汤浅平时做什么工作都很积极，这次去解剖室却迟了。虽然在那里他已经数次解剖过死于结核、赤痢、伤寒者的尸体，但这天他步履沉重。

解剖室前的空场上平时总有干活的苦力走来走去，今天却不见踪影。解剖室的入口处设了岗，卫生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肃立着。

空荡荡的解剖室约有三十多平方米，这里不仅集合了潞安陆军医院的军医，还有师团的军医。师团的军医部长小竹大佐正和西村院长谈笑。

向二人行过礼后，他站在顶头上司、传染病房主任平野孝次中尉旁边，环视了一下房间。

房间左角有两个农民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里。体格健壮的那个沉默着，而黑皮肤、小个子、上了年纪的那个则吓得一直在“啊呀——啊呀——”地叫。

护士把手术刀、截肢刀、截骨锯等摆在手术台旁边的桌子上。在手术器械稀里哗啦的响声中，军医和护士竟说着笑话，时而放声大笑。这意味着“一切已是家常便饭，丝毫没有什么紧张的”，不过是职业技术表演。

汤浅学着周围的军官，装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问旁边的平野中尉：“这些人做了必须得死的事吗？”（八路 八路军），“要杀掉！”噢，是吗。”汤浅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西村院长说：“那么开始吧。”卫生兵一推，那个健壮的男人坦然地走过去，自己躺在了手术台上。

汤浅感到意外，心想：“虽说是敌人，但值得佩服”，“也许是在日本军的威势前屈服了”。他相信是这样。

但另一个相貌贫寒的男人悲鸣着不肯前行。拿着刺刀的卫生兵越往前推，他越拼命往后缩。这个脸上带着污垢的男人退到了汤浅的面前。

手术演习

对于就要被解剖的人在想些什么，汤浅军医是缺乏想像能力的。在他看来面前的两个人仅仅是两件物品。他认为自己走上手术台的那个“虽说是敌人，但值得佩服，也许是在日本军的威势前屈服了”，这不过是他自己的贫乏人生观的投影。他觉得人只是在值得佩服或是懦弱这两种状态上活着。他无法想像无辜的中国人被杀的痛苦，也无法想像对活活被切碎这种人类最悲惨的死——如果相信来生的存在，这种不能瞑目的死将使亡魂难以得到超度——的恐惧。

对于汤浅中尉来说，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医师同事之间的关系，同被杀的中国人之间是不存在人的关系的。

那个脸上带着污垢的男人“啊呀——啊呀——”地呻吟着退到了汤浅的面前。

已经80岁的老医生向我讲到这里时咬着牙，竭力控制着眼里的泪水。“自己无情啊！”他说。

简短的一句话，却是经历了多么深刻的反省，使我第一次觉得那是在完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出来的。

“不该做那种丑恶的事啊！”

“站在了罪恶的立场上！”

“新来的军医，有勇气吗？……大家都看着你呢！”

“若是和这个脏家伙扭打成一团，会弄脏我的白衣服。”汤浅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做出威严的样子：“前边去！”他伸手推过去。

往后退的农夫由于突然从后面来的力量失去了平衡，到了前面，被按在了手术台上。他仍然发出“啊呀——啊呀——”的声音。“幸亏没扭打到一起。”汤浅感到得意。

对于其行为，现在的汤浅痛感自己“无情”。过去也想过“人不能没有人情”，但50多年前的“不能没有人情”是他对军医同事的伦理。“自己实在可悲呀！”汤浅长长吸入一口气。今天的他对一般的人、对作为人的自己感到“没有人情”。这是本来的伦理，而当年日本人的伦理却是依情况而变化了的。

话题再返回第一次活体解剖。

农夫抓住手术台，支撑着身体。